

世界现代史论文集

四川大学历史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一九八一·八·



出版说明

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于1981年8月上旬在四川省乐山市举行后，经与有关各方商定，由人民出版社和四川大学负责出版本届讨论会的论文集各一册。由于经费有限，我们只选用了部份尚未发表的论文十五篇，供世界史学工作者内部参考。

本集收入的文章，都由作者进行了订正或修改，付印前我们一般未再作改动。

四川大学历史系 世界现代史教研室

1982.9.

目 录

正确认识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斗争中的重大作用	梁宇德 李茂春(1)
为什么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多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王朝文(9)
试论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	唐同明(16)
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及其经验教训	王开琚(25)
波兰的第四次沦亡	陈正飞(34)
评日本侵华的所谓“不扩大方针”	王幼麟(45)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东南亚的扩张	唐希中(54)
瓜岛争夺战始末	郑庆云(62)
试论中途岛海战	袁昌尧(72)
浅析导致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原因	李德硕(79)
关于评价苏联农业集体化问题	李 晔(85)
重评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斗争中提出的 “两个公式”	王斯德 陈 兼(91)
列宁是怎样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为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服务的	高淑媛(98)
论日本工业化中的科技教育问题	陈显泗 黄家泉(105)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评价的若干问题	伍宗华 陈晓华(114)

正确认识第三世界在反帝 反霸斗争中的重大作用

梁守德 李茂春

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它作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独立的新兴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长时期来，对第三世界作用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议论，往往是估计过低，重视不够。从消极面看的多，积极面看的少；从孤立活动看的多，联系世界范围和整体力量看的少；从眼前斗争看的多，发展前途看的少。这些都是极其错误的，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本文试图就如何正确认识第三世界的作用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期引起讨论。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激烈的较量，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取得政治独立，顶天立地站了起来。第三世界就是在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也是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兴起了伟大的革命风暴，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成为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取得了一系列改变战后世界面貌的重大胜利。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严重摧毁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根本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为亚、非、拉美人民指明了胜利的方向。1953年朝鲜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把美帝国主义从顶峰打落下来，粉碎了它“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思想上解除了被压迫民族对美帝国主义的恐惧心理，促进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朝人民并肩战斗也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中国把坚决同亚、非、拉美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1955年亚非二十九个国家举行的万隆会议，第一次排除帝国主义列强的参与，独立自主地商讨和决定反殖反帝斗争、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的重大问题，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控制，冲击了战后初期形成的两个阵营的政治格局，开始了亚非人民自己决

定自己命运的历史，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形成和觉醒。1956年埃及人民反抗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胜利，是两类矛盾（即美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即美国、英法和被压迫民族）冲突和较量的结果，它显示了亚非人民团结战斗的力量，暴露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尖锐化。1959年开始的古巴人民和拉美人民反美斗争的高涨、1960年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和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六十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始终坚持反对强权政治和集团政治斗争的大方向，都沉重打击和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增强了亚非拉美人民的团结，壮大了第三世界的力量。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深刻反映了联合国内部的巨大变化。第三世界改变了联合国仅仅是受某些大国操纵的一架表决机器的情况，使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经常在这里受到正义的谴责。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联合国以大欺小，以势压人，为所欲为了。1972年埃及政府决定驱逐苏联顾问和专家以及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是对苏联控制、颠覆阴谋的有力打击，充分反映了埃及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尊严的强烈愿望和决心。1975年印支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东南亚国家中立化倾向的加强和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战争的坚持，完全证明了霸权主义不得人心，粉碎了苏联妄图“填补”东南亚“真空”的阴谋。七十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发起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战、各种区域性组织和原料输出国组织的建立，以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进行的破旧立新的斗争，形成了当代强大的正义潮流，大大改变了超级大国可以摆布世界命运的局面，震动了整个世界。

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表明，第三世界的形成虽然同地域环境有联系，大都属于亚、非、拉美地区，但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第三世界主要是由新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组成的。其共同特点是：在历史上，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长期遭受残酷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在政治上，都是刚刚独立不久的新兴国家，仍然面临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共同任务；在经济上，都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改革国际经济领域的旧秩序，建设自己的国家，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国际经济的新秩序。

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表明，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一支新兴力量。它既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力量，又包括进步的封建贵族的爱国力量，也包括社会主义力量。第三世界的觉醒壮大，经历了从主要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主要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两个阶段。其斗争性质，除社会主义国家外，基本上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

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还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把战后初期形成的“两个阵营”的政治格局，推向了多极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日益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变成了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

二

第三世界成为反帝反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世界就被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对立阵营，产生了三

大基本矛盾，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决定着帝国主义时代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列宁就是依据这些基本矛盾，早在1913年就明确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展开、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并列为“揭开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

历史的发展从来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合力”的结果，绝不是单靠某一力量所推动。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时代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是相互支持，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当然，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是时代的发展方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历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任何革命斗争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并不总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充当主角，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完全有可能出现于世界政治戏剧舞台的主要地位，成为最活跃的革命力量，决定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事实证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反而比较多地充当了时代的主角，处于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20世纪初，当机会主义刚刚拼命赞美“社会和平”，严重影响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时，亚洲的觉醒就成为世界革命风暴的“新泉源”，世界则处于作为“新泉源”的亚洲革命“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由于西欧机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由于西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用战争的胜利向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造成了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欧洲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相继取得胜利，反而逐渐消沉下去，而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却风起云涌，成为世界性的现象，因此，列宁依据新的形势，重新制订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方针，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补充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指明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主要打击目标，提高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地位，要求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从民族解放运动这条战线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开辟新的道路。列宁说：“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战略口号，“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看来，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完全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写成的，而从现在的政策来看，这是正确的。”（《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2—413页）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由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已经作为一支有世界规模的反帝队伍投入了世界革命斗争的激流，无论是斗争的范围和深度，取得的战果和积累的经验，都极大地超过了以往的水平。特别是战后三十多年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原来就存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由于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在国内建立了一套由政府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大搞所谓“工业民主”，吸收工人参加管理，并扩大国内的分配面，普遍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把“收买”范围从工人贵族扩大到广大工人阶层，因而极大地腐蚀了工人群众，致使工人运动长期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第三世界的斗争作为当前世界革命最为活跃、最有生气、最有力量的部分，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一定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认识第三世界的革命作用。第一，必须把基本上属于民族民主革命范畴的第三世界的斗争看成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主要内容。时代的发展必然把第三世界的反帝反霸斗争推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种只是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漠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用无产阶级革命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行，是毫无道

理的，也不符合帝国主义时代的实际。如果离开帝国主义时代的全局，不从世界范围而去孤立地看待第三世界的作用，那必然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出极其错误的结论。第二，必须以反帝作为评价第三世界斗争的主要标准。在今天，第三世界斗争的进步性和革命作用，完全不一定以这个斗争是否由无产阶级领导，是否有无产阶级参加，是否有共和的纲领和形式上的民主为前提，而要看斗争的实际内容，即看是否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就是说，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不能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为标准。当然，同无产阶级革命相比，同马克思主义相比，第三世界的斗争和第三世界进步的民族主义，肯定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估计，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第三世界斗争的革命作用，更不能借口第三世界已传入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共产党，而不管马克思主义是否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也不管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成熟，就立即全盘否定主要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斗争的革命作用。这样做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三

第三世界成为反帝反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也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所决定的。

第三世界是由殖民地半殖民地演变发展而来的。同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相比，第三世界发生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历史变化。亚非拉美地区一系列国家相继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独立，民族经济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被压迫民族开始从无权变为有权，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斗争手段和更广泛的斗争场所。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广泛运用和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采取联合行动，实行经济合作，即“南南合作”，对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然，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就是掠夺政策。帝国主义虽然被迫退出原有的殖民地，承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但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在经济上掠夺和剥削被压迫民族就不能生存。因此，它们既不会甘心失败，又不可能没有第三世界这个资源富饶、有大利可图的地方，于是便变换手法，主要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一方面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保留自己在前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特权，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经济技术上的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加重对第三世界的剥削。长时期来，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虽然在发展民族经济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破旧立新的斗争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霸权主义更是采用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剥削和掠夺。

必须指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一部帝国主义史，就是帝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的历史。在帝国主义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主要霸权国家会发生变化，但争霸始终存在。这样，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必然一再处在被瓜分被控制的威胁之下，承担着霸权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存在着“前门赶狼，后门进虎”的严重危险。正是在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明确告诫被压迫民族说：“争夺民族自由、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

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的目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721页)在第三世界的历史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有着沉痛的教训。

由此可见,在第三世界明显存在着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独立国家的联合斗争,蓬勃发展,这是主流;另一方面是旧殖民主义体系虽然已经土崩瓦解,但是霸权主义的新殖民主义体系正在建立和发展。因此,我们决不能把殖民政策模式化,也不能被一系列独立国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致于在霸权主义的新花招面前,丧失判断能力,看不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掠夺,漠视新独立国家面临的危险,以致于忘掉反帝反霸斗争和争取彻底的政治独立,实现经济独立的主要历史任务。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要独立,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展开持久的斗争。当然,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国的政治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各国的当权派在对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态度上也经常显出种种差别。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特别由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挑拨离间,第三世界内部矛盾重重,边界纠纷不断,甚至发生武装冲突。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第三世界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根本矛盾。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有着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苦难经历,他们的独立来之不易,决不愿再回到过去的屈辱地位。正是这些苦难的经历和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根本矛盾决定了第三世界各国必然会进行英勇的反帝反霸斗争。我们看问题首先必须看本质和主流,不能被眼前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因此,如果说,战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生存基础,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而决定了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具有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基础的强大力量,那末,战后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同样离不开第三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剥削被剥削、控制反控制的关系。第三世界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同样决定了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历史必然性、进步性和合理性,以及发挥主力军作用的长期性。

四

第三世界地广人多,资源丰富,市场广阔,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是第三世界成为反帝反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主力军的源泉。

第三世界总共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面积约七千多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人口约三十亿,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里地大物博,既有广大的市场,也有特别富饶的资源。许多战略资源的储量和产量均占世界的首位。如钻石,几乎占世界总储量的百分之百,黄金也占百分之七十,锂、钴、铬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石油是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生死攸关的物资,被称为“神经中枢”。目前,全世界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七十多个国家,多属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蕴藏的石油资源最为丰富,它已探明的可采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四分之三,不仅远远超过西欧和日本,连苏美两国也望尘莫及。仅中东地区,总储量就占世界的百分之五十八,总出口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这里踞有许多战略要地,无论从经济贸易上,还是从军事上看,其战略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仅全世界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如霍尔木兹海峡、好望角航道、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等,多在第三世界。这里的人口众多,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野蛮奴役和残酷剥削,受苦最深,受害最大,因而具有极大的革命性。特别在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的剥削和颠覆威胁下，第三世界绝大多数人都能团结起来，实行全民抗战，共同对敌。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爱国的封建地主、王公贵族，都能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反帝反霸斗争的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说，占世界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第三世界人民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中去，当然是一支了不起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完全能决定世界革命的结局和命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列宁就看到了这一点，充分估计了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巨大作用，认为他们“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列宁选集》第4卷第325页）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在讲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时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

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口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一般来说，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同旧中国的工人阶级一样，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他们的产生和发展，不但伴随着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而且伴随着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直接地经营工矿企业而来，因而他们较之本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其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他们身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多重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也是少见的，因此，他们在反帝反霸的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他们很多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同时，在第三世界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少数封建工头之外，整个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的。当然，目前在第三世界，工人人数很少，力量不大，在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但在反帝反霸斗争中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第三世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进一步发展，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必将进一步成长壮大起来，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担负领导者的责任，高举民族的旗帜，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说，他们是最有前途的阶级。第三世界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最终也是寄希望于他们。在第三世界，农民占绝大多数，约占总人口的81%。第三世界问题基本上是农民问题。从实质上看，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主要是对农民的剥削，因此，农民是第三世界发挥主力军作用的基础。没有农民，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第三世界的斗争。无视农民的力量，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第三世界的巨大威力。

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较大的革命性。由于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又是第三世界不够发达、力量弱小的新生产力的代表。这表明它们有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切身利益经常受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侵害，因而决定了它们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深刻性，也表明它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表现出动摇性、妥协性，因而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象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的资产阶级那样，在取得政权之后，很快就建立了完整

的资本主义制度，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彻底摆脱了受压抑被歧视的地位。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矛盾是长期性的，其革命性也是长期的。列宁一直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新兴的“向上发展”的、“相信未来”的、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阶级，看成是帝国主义时代同欧洲无产阶级并列的进步的、革命的阶级，认为它们正在作为民主派同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一起来“代替欧洲活活地腐朽了的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425、443页）十月革命后，列宁虽然更多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进步和妥协的两面性，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列宁从没有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列宁肯定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列宁甚至认为，即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起无产阶级政党之后，仍然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更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甚至作为革命的对象加以排斥打击。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表明，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可避免的矛盾，同本国无产阶级相比，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又都居于优势地位，因而在大多数国家都胜利地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甚至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也能实现一些民主改革，继续进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在国际舞台上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即使无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在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也有可能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为同盟者，甚至在革命胜利之后，还能继续跟随无产阶级，拥护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两面性，但不能简单地看成半斤八两，相互抵消。总的来说，其革命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它体现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那种笼统地说民族资产阶级只具有一定时期的革命性，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今天，我们承认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仍然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第三世界工人农民的力量，也要敢于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贡献。

必须指出，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结果，从当前来看，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必要的、进步的。列宁说过：“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问题时也曾深刻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这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同样，在今天的第三世界，也是多了一个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一个封建主义，少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因此，在这里发展一些资本主义，有利于资产阶级，也有利于无产阶级，也是一种“幸福”。第一，在这里发展一些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增强了这些国家反帝反霸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整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二，在这里发展一些资本主义，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能推动民族资产阶

级发挥其革命性，也能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毛泽东说：“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4页）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两面性，是不可能将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甚至为了狭隘的本阶级利益，往往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因此，第三世界的斗争要取得彻底的胜利，最终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所以，我们既要当前的实践充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要从发展的总趋势去认识第三世界斗争的革命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对第三世界革命作用的发挥，具有重大的意义。

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汇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发展。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把当时共有八十七亿五千万的世界各国明确地划分为三类国家：一类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战败国；一类是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一类是享受瓜分世界利益的战胜国。当时，列宁就把社会主义俄国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放在一类里，看到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完全和绝对的保证。中国共产党从1974年起一直明确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这就是说，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和任务，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时间的利害把社会主义中国和新独立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同共组成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社会主义中国宣布属于第三世界，必定推动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加强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促进反帝反霸斗争的发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在共同斗争中相互支持，团结战斗，必然增强反帝反霸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充分肯定第三世界的作用，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

在世界历史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总是以欧洲为中心，宣扬欧洲的“文明”和“进步”，鼓吹欧洲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至于被压迫民族则统统被诬蔑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天生的奴隶，只能任人宰割；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也根本不把被压迫民族放在眼里，极力贬低和攻击他们的革命斗争，否定民族解放运动。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们，也常常以欧美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看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暂时受到阻碍，看见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悲观失望的境地。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既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也重视民族解放运动，每当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时，总是指引革命人民从全局看形势，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鼓舞世界人民，振奋革命精神，增强人们的信心和勇气，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推动世界历史前进。今天，我们正确认识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斗争中的革命作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振兴世界，也同样是大有益处的。我们相信，在第三世界斗争的支持和推动下，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一定会出现新的高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必将汇合在一起，共同奋斗，最终从地球上埋葬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统治，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

为什么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多数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王朝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潮流。过去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纷纷起来开展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先后赶走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者，取得了民族独立。正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猛烈冲击和沉重打击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日益瓦解直至最后崩溃。

可以看到，在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中，由无产阶级领导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有中国、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或是由小资产阶级领导取得独立的，此外还有少数国家是由封建王公贵族或部落酋长领导的。这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为什么战后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是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这要从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亚非拉各国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这两方面来分析。

从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来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是继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么，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1249—1250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三个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打败了，丧失了它们所有的殖民地；英、法、西、葡、荷、比等国在大战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它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地位也大大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开始走向瓦解和崩溃。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加强了，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冲破了帝国主义统治的锁链，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使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变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阵线，大大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而且为亚非拉被

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从而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对于亚非拉被压迫民族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创造了条件，培养了人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所没有也不曾想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亚非拉国家的控制，这就给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同时又由于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在一些亚非拉国家开办与战争有关的工矿企业，这就使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战争结束后亚非拉地区的工业生产都有较大的增长。如埃及的棉纱产量从1938年到1946年几乎增长了一倍半，叙利亚的工商业投资总额1945年比1937年增长了一倍，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主要在欧亚两洲忙于战争，放松了对拉丁美洲的掠夺和控制，因此拉丁美洲各国的工业生产不仅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相反在战争期间增长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巴西甚至增长了百分之八十。随着工业的增长，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叙利亚的民族股份公司由1934年的9个增加到1947年的55个。非洲工人阶级的总数由战前的800万人增加到1300万人左右。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学校。战争唤醒了群众，又培养了人材。第二次大战期间，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仅非洲就有几百万人参战。他们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做出了光荣的贡献，同时在战争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战争教育了被压迫民族，促进了他们的民族觉醒，使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和虚弱实质。前津巴布韦民族运动的领袖、著名学者N·西索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同非洲人民的觉醒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战争期间，非洲人几乎同世界各国所有的人民都有了接触。在生死搏斗中他们相互结识。非洲人看到所谓文明、爱好和平和遵守秩序的人无情地互相残杀。……这些都使非洲人在心理上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N·西索尔：《非洲民族主义》第二版，第47页。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经过二次大战的锻炼，不仅提高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认识，增强了反帝反殖的信心，同时还学会了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术和方法。战后有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由参加过大战的复员军人直接发动和领导的，例如1945年5月8日，即对德战争胜利日，阿尔及利亚各大城市人民在退伍军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大示威，游行群众响亮地提出了“打倒殖民主义！”“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万岁”等口号；1948年2月，加纳爆发了以参加过二次大战的复员军人为主的反对殖民统治的示威运动，这次斗争从首都阿克拉扩展到全国许多城市和乡村，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由此可见，二次大战在客观上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人材。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后果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力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另一方面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世界基本矛盾对立双方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就成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战后这种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好形势下，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时能表现出更大的革命性，也就是说，它不仅一般地能够积极参加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运动，而且也能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落后，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所以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一种新的向上发展的力量。

同时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处于被压迫民族的地位，它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它们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它们要求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另一方面，它们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矛盾，这又决定了它具有妥协性、动摇性的一面。然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又有不同的表现。有时更多的表现出它的革命性，有时则更多的表现出它的妥协性；有的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大于妥协性，有的则妥协性大于革命性。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二次大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力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由于民族独立运动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表现了更大的革命性，这时它的革命性大于妥协性。因此战后不少国家的资产阶级就能够举起民族独立的旗帜，动员组织并领导人民群众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建立起民族独立的国家，而且在取得独立后还能为维护民族主权、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而斗争，能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国际斗争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帝国主义力量遭到严重的削弱的形势下，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打击下，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已经无力继续维持过去的旧殖民统治秩序，他们深感不能继续推行昔日的殖民主义政策了。为了保持和维护他们的殖民利益，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变换手法，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诸如实施一些“政治改革”，的计划，建立“英联邦”、“法兰西共同体”等组织，允许一些殖民地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一定的权利，实行自治等等，妄图以此来限制被压迫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防止殖民地国家实现真正的独立。事实上，帝国主义的这些新策略在一些国家的确也收到了效果，起到了作用。可以说，战后出现的一些由资产阶级领导通过实行内部自治等改良主义道路而实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就是这种新殖民主义政策的产物。有些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既害怕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又想争取国家的独立，于是出现了一条利用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政治改革等手段，首先实行内部自治，然后再逐步地和平地取得本国的独立的道路。尼日利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阿齐克韦就为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确立了一条通过改良主义获得独立的道路：首先实行地方自治，成立代议制政府，为期十年，代议制政府期满后，成立责任政府，为期五年，以上十五年期满后，尼日利亚就可以宣布独立，不过仍然保留在英联邦内。阿齐克韦主张通过颁布民主宪法，实行自治，进行各种经济政治改革等手段，但坚决反对采取暴力手段。这种改良主义的“独立”运动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赞同的，尽管它们是被迫的，违心的。但是由于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帝国主义对于它的殖民地，与其让它们获得独立，还不如让它们实行自治；如果不行，那末与其让它们彻底独立，还不如让它们形势上独立；如再不行，那末与其让它们立即独立，还不如让它们逐步独立；与其让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还不如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就是帝国主义在战后不得不采取的方针。总之，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它是不会轻易放弃它的殖民利益的。正是在战后帝国主义改变策略的引诱下，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充当了改良主义独立运动的领导者。

总之，由于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殖民主义体系日趋瓦解，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的改变，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而无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或不成熟，因此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这其中有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领导经过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独立

的，也有资产阶级温和派领导经过改良主义的道路取得独立的。需要指出的是，战前就有不少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过改良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主义”的“不合作运动”，然而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而战后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通过改良主义道路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国家，究其原因，不能不看到战后的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亚非拉各国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来看

从亚非拉各国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来看，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力量还相当薄弱，或者还不成熟，或者犯了错误，而资产阶级相对来讲则居于优势，这样就使资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由于亚非拉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发展不平衡，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在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没有取得领导权的原因和情况也是不同的，具体分析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三种原因和情况：

第一种原因和情况是，不少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长发展起来，还没有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主要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由于帝国主义在掠夺、瓜分非洲时，是以贩卖黑人奴隶、开采矿山、建立种植园、攫取各种原料为目的，因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除了种植园和采矿业有所发展外，其它工业是很薄弱的。与此相适应，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少，流动性大，而且非熟练工人多，有技术的熟练工人多是白人。种植园中的农业工人流动性更大，多是春天来秋天走的季节工人，因而没有形成固定的阶级队伍。同时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其殖民主义统治，在这些地区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度和隶奴制度、封建制度，并采取各种手段，在部落、氏族之间制造矛盾，挑起纠纷，这样在非洲的工人阶级内部，常常由于部族、地区之间的矛盾而影响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统一，所以非洲的工人阶级队伍长期处于涣散的状况。同时马列主义的思想在这些地区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当然也就谈不上由无产阶级来掌握运动的领导权。相反，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却比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阶级要发展得快，力量要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不少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在他们中间产生和传播开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一批在宗主国留学的非洲知识分子，提出了要求非洲独立、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族主义思想。1919年在巴黎创立了泛非主义学会。以后在各地区又提出给予非洲人自由，如不给自由，非洲人就有权利争取等等。在这批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者中间出现了象肯尼亚的肯雅塔，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加纳的恩克鲁玛，塞内加尔的桑戈尔等领袖人物，战后在国际形势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他们举起了反帝反殖的旗帜，提出了民族独立的纲领，自然也就成为运动的领导者。这些人尽管出身不同，或者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对帝国主义有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妥协和动摇，或者甚至还提出了要实行非洲式的社会主义等等，但从他们的纲领、方针、政策看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

第二种原因和情况是，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也已发展壮大起来并建立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但是无产阶级没有挑起领导者的重担，相反却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这样领导权就落到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手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

斯和摩洛哥。

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比较起来，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之一，不仅早期就有较发达的棉麻纺织业，而且以后冶金、化学、食品、皮革等工业也相继发展起来。因此印度的无产阶级产生较早，发展也很快，数量也比较大。由于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是极其深重的，所以印度无产阶级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登上了推翻英帝国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的舞台，1908年孟买纺织工人抗议处决印度民主党员季拉库的总罢工，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他指出，孟买的游行示威和罢工表明“印度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了”，（《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8页）20世纪20年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印度传播，印度共产党也开始建立，这个过程和中国党的创立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1920年印度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开始了印度共产党的筹建工作，1925年在印度国内的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召开了会议，选举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总书记。1928年12月成立了印度工农党，1933年成立了全国性的共产党。然而印度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里，没有积极地去参加和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主要表现在他们没有把革命的主要矛头指向英国帝国主义，没有举起反帝的大旗，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共受罗易的所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影响很深。罗易的所谓“非殖民地化”理论就是否认帝国主义同印度人民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印度的主要矛盾，而认为“印度革命已经渡过了资产阶级”阶段，因此印度应该直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了。在罗易的这个“非殖民地化”理论的毒害下，印度共产党较长时期没有积极领导人民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反帝的旗帜自然就被资产阶级夺去了。印共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还表现在他们不重视农民的工作，没有深入农村去领导农民为废除封建的土地关系而斗争，这实际上放弃了民主革命的旗帜，也就是放弃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印共放弃领导权同时还表现在他们没有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没有和资产阶级建立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在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中没有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由于印度共产党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致使印度的革命遭到了失败。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北非的这三个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在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受到法国共产党的重大影响，都没有高举民族独立的大旗，严重地脱离了本国的人民群众和革命斗争实际，以致民族革命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所掌握。法国共产党对于北非三国的民族独立斗争一向就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相反他们用民族沙文主义去压制北非人民的革命斗争。法共领导人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嚷：“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还极力为法国资产阶级提出的法兰西联邦吹捧，强调非洲法属殖民地保护国的独立运动要以在法兰西联邦范围内取得一席之地而满足。正是在法共的这种沙文主义思想的影影下，摩洛哥共产党忽视了民族独立的重要意义，没有明确提出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以致领导权被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独立党所掌握。突尼斯共产党也没有提出完全独立的主张，它只是要求取消保护国制度和全部殖民机构，建立突尼斯的民族政府，然而这个政府仍应留在法兰西联邦内。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由于受到法共的民族沙文主义影响而完全放弃了对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早在1926年第三国际创建初期，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作为法共的支部就已成立，到1936年正式成立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但阿共在思想上，政治上仍然深受法共的影响。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追随法共的民族沙文主义线路，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

色。1945年春，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大饥荒，甚至比较富庶的地区也有大批农民饿死，同时瘟疫流行，死于疾病的人不计其数。法国殖民者对此熟视无睹，不肯采取任何措施，这就使人民对殖民者的仇恨与日俱增。同年5月1日和8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大示威，提出了“打倒殖民主义！”“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万岁！”等口号。但是群众的和平示威遭到了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全国竟有四万五千人惨遭杀害，成千上万的人被监禁或流放到沙漠中去。1945年的五月事件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从1871年以来第一次掀起的全国性的反殖民主义的大斗争。作为阿尔及利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阿共本来应该去积极参加和领导这一次大规模的反殖斗争，但是阿共领导非但没有参加和支持这一斗争，相反在大屠杀开始时，就反对人民群众对血腥屠杀进行武装抵抗，他们甚至还污蔑示威群众是“混乱的煽动者”，是“一小撮大地主”。从此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对阿共大失所望，阿共在群众中威信扫地，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以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阿共没有加入民族解放阵线，它认为武装起义是一种冒险，认为阿共是“合法的”，“因此必须最充分的利用这种地位”。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经过七年多的武装斗争，终于结束了长达130多年的殖民主义统治，获得了独立。在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可以充分地看到，深受沙文主义毒害的共产党远远不如资产阶级的激进派。

第三种原因和情况是，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虽然也积极参加和领导了民族民主革命，但由于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没有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以致领导权被资产阶级所掌握或革命的成果被资产阶级所篡夺。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马来亚等就属于这一情况。其中最典型的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5月23日，比中国共产党还早一年多。印尼共产党成立后就积极地投入了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斗争。1926—27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了印度尼西亚第一次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打击了荷兰帝国主义。起义失败后，印尼共被迫转入地下，进行分散的小组活动。1942年日本法西斯侵入印尼后，印尼共又领导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斗争。经过抗日斗争的锻炼，印尼共增强了战斗力，人民提高了政治觉悟，成为发动八月革命的巨大动力。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印尼人民要独立的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国内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大好形势，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夺取日寇的枪支，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农场，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正是在印尼共领导的人民斗争的推动下，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内阁政府。然而八月革命期间，印尼共没有单独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致使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就被资产阶级所篡夺。1948年，以穆罕默德·哈达为首的反动资产阶级篡夺了全部国家政权，并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对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志士实行了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政策，血腥屠杀、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茉莉芬事件，使八月革命遭到了失败。印尼共之所以没有成为八月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是因为印尼共是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投入了八月革命。当时印尼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还比较软弱，尤其是在理论上印尼共还比较幼稚，对印尼社会的情况还缺乏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从而不能正确地认识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纲领、政策和策略，也就是说还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茉莉芬事件中遭到沉重打击的印尼共产党，总结了经验教训，又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后来不久，印尼共很快就发展成为拥有三百万党员的大党。在